

粤港澳大湾区：新尝试、新实践、新愿景笔谈

申 勇等

编者按：2019年2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推动新时代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规划到2035年全面建成国际一流湾区的美好愿景。《纲要》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建设的各方面，特别明确了空间布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三大合作平台建设等内容，并做了具体部署。本刊特邀请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八位专家从当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等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提供更具价值更具共识的理论成果。

当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谭 刚

2018年12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作出重要批示，其中明确要求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2019年2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空间布局一章中提出大湾区中心城市与核心引擎问题，要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视角来看，增强湾区核心引擎功能、发挥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已经成为建市40年的深圳所肩负的新的重大国家使命。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经历了从“新引

擎”到“核心引擎”的变化。在2018年1月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引擎”，与同期广州市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相比有所不足。根据习近平总书记3月7日在广东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指示精神，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对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作出调整，提出“携手港澳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建设全球城市”，明确提出了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定位。这一定位不但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在给深圳的批示中明确要求深圳增强核心引擎功能；而且这一定位实际上还涉及香港、澳门，通过深圳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的表述，实际上把港澳也提升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所确定的四个核心引擎的定位与思路。

从湾区城市的比较来看，深圳经过40年的改

革开放探索与创新发展实践，已经具备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当然也存在必须正视并努力加以弥补的不足和短板。从综合实力来看，自2016年起深圳经济总量成为广东省第一，2018年又进一步成为大湾区第一，为深圳发挥湾区核心引擎的功能与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从比较优势来看，深圳在不少排行榜特别是中国社科院所作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有不少指标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有助于深圳更好地当好湾区核心引擎。这里以科技创新为例稍作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总结发展现状时提到创新要素集聚的优势，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以香港的大学为代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尽管香港的大学数量不多，但长期至少有4-5所大学能够排名在全球前100名之内，表明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来看具备一定优势；二是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参加广东团审议时所说，近年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目前占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70%以上的深圳大疆创新公司，可以说是把香港的基础研究能力与深圳的创新转化能力结合起来的最好案例。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来说，就是2017年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反映了深港两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创新集聚优势和国际化水准。除此之外，深圳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比较优势，也使得深圳具备了在大湾区城市群中当好核心引擎的基础条件。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具备湾区核心引擎条件是一回事，能不能当好湾区核心引擎则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深圳要当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不仅有赖于中央明确赋予及授权，更要依靠自身不懈努力、大胆探索、奋力开拓，从而不断增强在湾区中的核心引擎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总体上分析，我认为当前主要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确立的四个中心城市和四大

核心引擎中，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明确深圳核心引擎的独特优势是什么，深圳与其他三个核心引擎的区别在哪里，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如何更好地确立，当好核心引擎的路径选择与时序推进等重要问题。二是不断增强深圳作为湾区核心引擎的优势功能，依托建市40年来形成的改革先锋、开放先行、创新先发等综合性比较优势，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开放合作引领、优势产业牵引、生态文明涵养、人文理念聚力、营商环境支撑、发展平台助推等多种方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是通过与国际一流湾区之核心引擎城市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核心引擎城市相比较，尽快把深圳与湾区核心引擎不相适应的自身不足及功能性短板弥补起来，例如不断提升和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提升科技创新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及源头创新能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等等，从而不断增强深圳作为湾区核心引擎的功能，进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核心引擎作用。

作者：谭刚，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

申勇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提到要构建创新共同体、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等。这个提法既契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又符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状况，同时还指明了粤港澳大湾区今后的发展路径。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最杰出的科技创新城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与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比较，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方面，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仍然差距较大。尽管我们的PCT专利数可能超过硅谷，但是我们

的半导体和生物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人家，我们走的是应用创新的路子，有华为、中兴、腾讯、中国平安等，但是半导体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值得我们去反思。建设现代化强国首先是科技强国，我们的基础研究一定得赶上去，至少不能让别人“卡脖子”。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大力度推动国家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是条件最优越的区域。香港有4所世界100强大学，40多位一流科学家和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学实验室，香港的自由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为科技进步带来最优的营商环境；深圳有颇具世界影响的科技企业，华为甚至还成为世界5G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东莞有令世界瞩目的加工基地。而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不仅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更有敢于冒险和开放的移民文化和创新生态。如果通过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形成科创共同体，实现强强联合，完全有可能带动第四次工业革命。

硅谷创新与深圳创新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低成本下的应用型创新，硅谷的创新有人总结为“车库”创新。总结深圳的创新，我认为应该叫“城中村”创新，华为、腾讯、比亚迪等都是出自于城中村。但是硅谷还有另一类创新，在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周边高校和研究机构云集，这是波士顿能够取得科技创新成就的奥秘。深圳如果要更上一层楼，需要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科技队伍和一流的科学研究体制来支撑。

香港正在出台2030远景规划，依托香港的大学和实验室优势建设东部知识走廊和科技产业，我们要主动对接，关键在于“共建”。可以打造一个“点、线、面”的全面对接空间布局。所谓“点”，就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个点的重点是要探索科技创新合作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共建的共赢制度。所谓“线”，可以沿深圳东西双向建设两条纵向科技发展轴带。在东部，依托新建设的莲塘口岸和沙头角区域为连接点，推动龙岗、坪山、盐田、大鹏等东部城区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形成与香港东部知识走廊的无缝对接。在西部，我们要主动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

新走廊，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布局。所谓“面”，可以依托前海、大运、东莞松山湖形成一个科学创新的黄金三角，从前海到大运，重点依托华为、南山高新园区、前海等形成科技产业带；从前海到松山湖以及从大运到松山湖，可以依托大空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中心；将三解区域的中间地带光明新区和西丽建设成为深港合作的大科学中心，支持“黄金三角”的科技创新产业共建共赢。

要形成“共建”的体制机制，就要理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把体制创新共同体这个概念做好的话，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能够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且还有可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申勇，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

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论逻辑

宋晓东

2019年2月1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以9+2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拉开序幕，这是继200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之后，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指导这一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区域合作发展的时序演进和地域拓展，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上可以给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解释：

一是区域经济学角度。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从点轴延伸走到网络共生。“点——线——面”是区域空间演绎变化的基本规律，珠三角地区的发展首先从点（广州、深圳、香港）开始，依托广深高速、广深港铁路的交通轴，逐渐形成广深发展主轴，沿这条主轴人口集中、产

业聚集，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地带，这也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空间发展的最突出特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代，整个 9+2 地区空间格局上呈现出显著的圈层特征，出现了包括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三大城市群，“1 小时”和“半小时”交通圈缩短了城际间距离，使得生产生活资源要素的配置在城市和城市群间日益密切，区域发展从点轴延伸逐渐拓展到网络共生。

二是产业经济学角度。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从工业商贸主导走到创新引领。“珠三角地区最初的产业发展重点是围绕工业商贸展开布局，工业商贸是整个地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香港是享誉全球的自由港，是国际企业总部和机构聚集地，面向世界市场拥有丰富的贸易资源和渠道。在产业分工上，形成了香港负责销售服务，珠三角地区负责加工生产的“前店后厂”的格局。广州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商品出口门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的龙头。由此可见，在对外开放初期和中期，工业商贸是决定珠三角产业分工关键因素。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代，科技创新成为引领整个湾区产业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量。现代创新发展呈现出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的趋势，科技进步的同时产业同步改变，技术成果转换为市场产品的时间周期大大缩短，因此，决定产业分工，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布局的关键因素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商贸要素，创新要素的集聚成为决定产业发展的最关键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分布充分体现了这一发展规律。深圳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就是因为其具有突出的创新发展能力。

三是贸易经济学角度。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从垂直型走到水平式。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合作主要包括垂直式、水平式以及二者兼有的混合式。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更多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珠三角地区早期发展主要表现为垂直型分工特征，不仅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而且本地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较大。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

代，大湾区整体经济状况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拥有具世界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集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和服务供应链港。湾区内城市间的发展水平日益趋近，城市间的合作开始立足于双方的水平优势，替代以往的垂直差距。例如，大疆无人机就是香港科技创新优势与深圳产业制造优势的紧密结合，是完全基于水平式的合作。

四是发展经济学角度。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阶段从中低收入为主走到中高收入并存。人均 GDP 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阶段水平的重要指标，珠三角地区发展的早期和中期，人均 GDP 以中低收入为主。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 GDP 达到 22000 美元，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1 个城市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港澳，人均 GDP 在 5 万美元以上；第二梯队是广州、珠海、深圳，人均 GDP 突破 2 万美元；第三梯队是东莞、中山、佛山、惠州，人均 GDP 在 1.2 万美元之上；第四梯队是江门、肇庆，人均 GDP 在 0.8-1 万美元。人均 GDP 到达中高收入并存以高收入为主的阶段，标志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主题逐渐与中等发达国家趋同。

作者：宋晓东，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
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合理定位与分工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

彭芳梅

一、谋划“点线面”空间布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要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历程看，对大湾区的空间发展脉络正是沿着“点线面”空间格局进行演绎的。

整体来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占广东省 31%，但是它的人口占到 60%，其人口和面积

所占广东省和港澳地区比重呈现“倒挂”。这说明在广东、香港、澳门目前空间格局下，大湾区是一个典型的极点。另一方面，从大湾区内部空间格局来看，也存在典型极点。纲要强调发挥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强联合指的是“香港和深圳”、“广州和佛山”、“珠海和澳门”。据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这三个强强联合的经济总量，第一个深港经济总量达到4.8万亿，广佛经济总量达到3.2万亿，珠澳经济总量是6500亿，而整个大湾区的GDP规模是10万亿，这三个极点已经达到7亿。大湾区代表的是中国高度开放的区域，但它内部核心边缘圈层结构也非常显著。未来如何依托打造发展轴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是优化大湾区空间布局的有效路径。纲要明确了优化提升中心城市，依托各类轴带，强化轴带支撑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可见“点线面”空间布局正在积极谋篇之中。

二、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变典型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典型的河口三角洲，这里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集聚，实现了城市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全新替代，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河口三角洲经济形态，正在转向更高质量的湾区经济形态。

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系、空间特点，可归纳总结为独特的“空间关系资本”，一是高度发达的市场化连绵区域，这里城市连着城市，背后是市场化绵延市场；二是一大批引领性的全球化企业；三是多类型完整的产业链；四是已历经过多轮的自我升级、自我迭代；五是已有城市群分工结构下各地集聚叠加的竞争优势；六是较为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一种支撑；七是广州、深圳等地已经具备的发达的内向型金融服务业发展实力；八是香港、澳门已具备的外向型金融服务业发展优势。这种独特的空间特征既是也是支撑未来大湾区发展的空间基础，也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能建成世界一流湾区的空间现状优势。

三、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

梳理国际三大知名湾区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所有湾区都存在圈层结构、分工明确的城市群框架。如纽约湾区的圈层空间结构显示，以纽约的

金融、商业、服务业发达；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和教育优势凸显；费城的清洁能源、制药、交通服务等优势显著；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功能、旅游和高科技服务特色显著；巴尔的摩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等优势特点，可见纽约湾区各区域，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分工明确。旧金山湾区空间上可分为北湾、南湾、东湾、旧金山市，也是呈现功能区分明显、分工协调特征。东京湾区由于空间紧约束、资源紧张等，促使人口和经济不得不向湾区高度集聚，将东京发展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世界城市，但是东京都市圈依然存在紧凑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

对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地来说，积极融入分工协作的空间格局中，大有所为，我们认为未来很有可能形成“核心圈+紧密圈+扩展圈+辐射圈”的大湾区城市圈层结构。一是以“港、广、深、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超级核心，不断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二是以湾区内所有城市即“9+2”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的“紧密圈”，落实纲要部署，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三是以“粤+2”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扩展圈”，形成以重要节点城市发展，推动广东省内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局面。四是以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辐射圈”，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对更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辐射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

作者：彭芳梅，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

副教授、博士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

范宏云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围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部署规

划的，具体地讲就是围绕我们党的三大历史性任务进行部署规划，第一个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个任务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第三个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是紧紧围绕这三大历史性任务进行部署规划的。如第4-7章是围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8章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第10章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平台，第5章加快基础设施互通互融等等，都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第9章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此，不但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纲要前言中有一句话定性了建设大湾区的意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又是推动“一国两制”实现发展的新实践”，可见作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它的第二个战略意义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一国两制”新实践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港澳同胞感情，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一国两制”新实践第一个“新”在于：新时代以来，中央开始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回顾前20年来的“一国两制”的实践，从政策上讲，更多强调港澳自身的繁荣稳定，强调港澳对国家的责任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保持港澳繁荣稳定。而在此之前有一句话，即港澳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主权和安全。这是第一次强调港澳对国家的责任。十九大报告对这个责任的表述更明确了，即港澳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祖国人民一起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第二个“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港

人人心回归的重大举措。1997年香港回归，主要是政治回归，恢复行使主权，由于香港和内地经济和社会的融合有限，香港的人心回归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香港爱国爱港力量还需增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制度和文化的认同还有限，极少数人走上了逢中必反甚至“港独”的邪路。实践表明，做好香港人心回归工作，是“一国两制”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打造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尤其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涉及促进港澳人士在内地的就业创业，纲要对港澳青年到内地交流、就业做了很具体、细致的规划，比如说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还强化内地与港澳青年爱国教育，加强宪法精神、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为港澳人士在内地尤其在湾区就业创业、学习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这些措施对实现港人文化认同，人心回归，从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意义重大。

第三个“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一国两制”新实践，增强“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未来两岸统一作出新贡献，打造新样板。“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案，但不可否认，由于台湾当局的长期误导，目前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认同度不高。如何提高“一国两制”在台湾同胞中的认同度，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倡议，即探索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是一种探索，通过大湾区建设要让台湾人看到，“一国两制”使港澳保持了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获得巨大的利益，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获得了更大发展机会和空间，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范宏云，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统一战线理论
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深港合作

徐晓迪

首先，自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湾区通常随着工业革命的衍生物而出现，这是世界产业协作与分工细化必然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760年，诞生了人类第一个湾区伦敦湾区，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了纽约湾区，第三次工业革命诞生了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从技术演进路径和湾区发展规律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的出现正是全球产业高度融合的必然趋势。湾区的诞生通常具备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对能量的调用，二是对信息的转换。粤港澳大湾区正好在这两个要素方面做了关键储备。在信息的转换上，深圳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世界500强企业，在5G技术的应用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能量的调用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制造、智慧城市、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信息和能量等要素的聚集，再加上资源配置与效率方面的区位优势与金融优势让湾区未来的发展更加明朗。在全世界20个金融中心中，粤港澳占三个；在中国五大金融中心中，粤港澳同样占了三席。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突出的。

其次，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时代政治来分析。伦敦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四大湾区基本上都是市场配置、自然地理条件禀赋所形成的。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却不一样，它是第一个有全面战略纲要的湾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湾区，同时还有独特的“一国两制”的实践场域，这一切都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独特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核心要素就是要“破墙”，比如《纲要》讲到智慧城市，表面上智慧城市是一个技术概念，但它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一个打破边界观念系统，要在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进行资源的高效配置，不仅要打破地理上的边界，而且还要打破体制之间的边界和人与

人之间心理的边界，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内涵。

要怎样才能解决香港与深圳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呢？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较，最大的障碍是融合度不够，要素流动的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整个湾区内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货币体系、三个司法制度，他们彼此嵌套，互相牵制，导致三地特别是深港之间人、物、资金、信息等要素流通效率不尽人意，亟需通过顶层设计，做好各类规则的衔接。根据各个层面要素流通的难易度不同，在物质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打通，比如高铁、地铁、边境等方面要持续投入；在体制机制方面敢于破冰，如独立关税、自由贸易、金融互联等问题上需要双方进一步协商与协作，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在行业标准与规则方面要敞开大门，特别是香港的专业服务领域，如律师、医师、教师、会计师等行业可以通过承认其资质的方式，帮助其来内地发展；在观念转变方面要主动加强沟通，在涉及文化教育等方面更要学会变通，通过物质层面的层层叠加完成观念层面的转身。总的说来，就是构建一个多核化、国际化、跨区域的要素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深港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快捷无障碍流动。

当前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赋予深圳更多探索和践行的历史使命，加快在一些制约深港两地要素跨境流动上的关键破题，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各类衔接问题，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时代内涵，同时协同香港实现从基础设施到数字金融，从知识产权到市民待遇双向互动，便利香港居民来深生活、香港青年在深发展创业，推动优势资源彼此共享、加快两地信息快捷流动，更好地解决香港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矛盾与现实问题。

作者：徐晓迪，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
教研部教授、博士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范绍庆

社会融合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发展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研究领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我们从研究背景、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的研究背景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角度是把大湾区的发展和中國发展战略放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引擎之一和重要战略支点。第二个角度是将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比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第三个角度是从香港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应有之意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的福祉，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近年来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瓶颈，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空间受限，人口老龄化严重，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流动趋弱，普通民众对国家认同感降低，社会撕裂、社会隔离现象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最终使大湾区的群体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同时共享社会福利和成果。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目前，主要从经济、文化、政治（一国两制）等视角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着眼于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明确内部城市的各自定位和发展方向。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的研究内容。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生活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等多个方面。由此，我们提出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是社会融合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大湾区社会认知的历史演变和具体

体现值得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深入了解大湾区社会情感的本土特性，分析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状况及行为预测。鉴于大湾区各自社会心理的独特性，我们应从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等维度来研究大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是社会融合发展的社会交往。社会交往中大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正向互动，城市之间交流与合作以及社会及民心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大湾区社会交往的对象、方式、机制、议题和形式都需要进行研究。

三是社会融合发展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中社会融合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大湾区的社会融合发展，实际上也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大湾区社会融合提供大湾区认知视角，厚植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基础，推动大湾区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认同。

四是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联通珠三角及港澳，形成互联互通的区域共同体；构筑统一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动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完善区域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展就业创业空间，推进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全面享受“同等待遇”，共享优质公共服务，形成人文、休闲、健康的社会共同体。

五是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一方面政策和制度驱动，另一方面是市场和社会动力，两者相互结合，实现社会结构性和制度性融合，推动大湾区社会融合发展。对于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来说，高质量高起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鉴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殊情况，粤港澳大湾区在法律法规、医疗养老、就业就学、文化认同等社会融合上仍需要更多创新思路、互补发展与合作机制。

作者：范绍庆，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科研管理处处长、教授、博士

粤港澳大湾区视角下

深圳海洋强市战略构想

李伟舜

一、新时代深圳海洋强市战略的意义

深圳海洋强市战略是推进大湾区战略的基本抓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把海洋经济作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之一。因此，深圳的现代产业体系不能没有海洋经济这一驱动力，一是能有效发挥深圳的海洋禀赋优势，二是能带动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能与湾区经济相匹配，可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综合竞争力。

海洋强市战略是深圳展现大湾区核心引擎职能的应有之义。目前，深圳海洋经济贡献度已达全市生产总值的19.5%，海洋经济成为深圳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深圳建设更加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基本因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产业不但有利于深圳口岸型城市的快步建设，还可为现代物流业和服务业的深度开拓夯实基础，促使旅游业迅速向多样化迈进。深圳的海洋产业并非单打独斗，而是能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协调共进，彰显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重要作用，以此体现深圳海洋强市战略的核心价值。

二、深圳海洋强市战略的基本构成

深圳海洋强市战略是国家海洋战略和广东省海洋战略的子系统，其战略核心为全球海洋经济中心城市，战略驱动轮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和粤港澳大湾区龙头城市，战略基础工程为海洋强国示范区，战略制导器为智慧海洋，战略防御系统则是法治海洋。

海洋综合管理示范区是国家首次赋予深圳的历史任务，深圳当把海洋强国示范区往纵深方向全力推进，形成具有深圳优势的海洋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深圳全面推进海洋强市战略，要全力实现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龙头城市职能，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为战略驱动轮。深圳的海洋强市战略，要与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地位相匹配，要以此为战略支点，加强区域

联动，带动大湾区早日跨进世界湾区经济体前茅之列。海洋强市建设离不开海洋大数据的支撑，智慧海洋是深圳全面建设海洋强市的信息系统，可为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建设海洋经济、海洋法规体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等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源，让各方分清方向，作出科学决策，因此，智慧海洋是“制导”“传感”系统。法治海洋可为海洋强市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后盾，以良善海洋制度体系促进海洋强市战略稳健推进，是海洋强市的显著名片。

三、深圳海洋强市战略的基本路径

秉承科学的治理理念。一是坚持海洋强市战略系统推进，总规划与子规划形成科学严密的总体；二是有效的海洋强市法规制度体系为海洋强市战略提供必要保障；三是高度重视海洋的源头治理，对海洋事务要实行多维度立体综合施策；四是有力的海洋强市治理评估体系是海洋强市战略的标配。

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深圳海洋强市战略的第一动力源，因此，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确保海洋科技创新持续性，实现海洋科技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以“协调”发展为理念，就要坚持海陆统筹，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协同发展，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海海、海陆、陆陆等经济的联合与协调，锻造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建设。深圳海洋经济应坚持绿色发展，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深圳海洋强市还应在湾区间形成共享，不但湾区间开放，还要对全球开放，让全球海洋经济中心城市构建成为可能。

从市情出发，演绎国家省级海洋战略。国家省级海洋战略部署应在深圳的海洋强市战略得到贯彻。深圳应根据海洋强市战略的发展阶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发挥优势，弯道超车，先行示范，落实好国家和省级战略，建设世界级影响力的海洋城市，引领大湾区发展，实现湾区经济协调融通跨越式奋进。

作者：李伟舜，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钟晓媚